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3.010

#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与 农户生计资本变动

——基于湖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调查分析

周丽,黎红梅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集中安置移民相比分散安置移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显著增加。其中,移民物质和社会资本显著增加,自然资本显著减少,且物质和社会资本增加量大于自然资本减少量,而金融和人力资本增加量没有显著差异。安置点选择、家庭非农就业占比会显著影响移民生计资本,进而对搬迁减贫效应产生显著影响。据此提出,易地搬迁要完善安置区基础条件,增加移民社会资源禀赋,加大就业扶持和产业发展,调整土地、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以保证移民生计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可持续生计;DID模型;安置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3-0085-08

从农户生计微观角度研究扶贫搬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已成为贫困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现有文献大多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展开研究:定性分析了因地制宜实施相应安置模式能有效改善移民生计,提升扶贫搬迁减贫效果;定量分析了安置模式对移民生计资本变化的影响,为实现移民可持续生计提供了基础。但已有研究在探索安置模式对移民生计活动影响时,侧重于比较搬迁户与未搬迁户生计资本差异,较少区分不同安置模式对移民生计影响,因此未能有效识别出安置政策对移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净效应,难以精确评价安置政策的真实成效。这一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政府安置政策的完善,而且也将成为后续扶持措施拟定及区域经济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为此,本文从安置模式对移民生计活动的影响机理入手,基于湖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移民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探索不同安置模式(集中/分散)对移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净效应,实证检验安置政策实施成效,为创新后期扶持政策拟定提供决策依据。

## 一 安置模式对移民生计的影响机理:理论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的安置模式有分散安置和集中安置两种。目前,各地较多采取了集中安置模式,政策初衷在于发挥集中安置区统一规划、集中建设的优势,让移民能够获得便利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公共服务、多样的生计机会,最终实现生计可持续和脱贫致富。基于移民视角,安置模式对移民生计的持续影响,不仅体现在移民生产生活地理空间上的转变,也体现在对移民自身资源禀赋的影响以及居住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转变。安置模式与移民生计的关系包括了如下内容递进的层次(见图1)。

第一层次,安置区地理空间变化对移民生计产生直接影响。易地扶贫搬迁的初衷就是将贫困农户安置到更适宜居住的地方,地理空间的优化改善是其最基本、最直观的层次。移民迁入安置新址,相比原居住地具备更良好的居住条件、更优越的地理位置。这种地理空间的改变给移民带来各类生产生活成本的变化,显著降低移民外出务

收稿日期:2019-12-15

基金项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湘西地区开发重大问题研究项目(湘发改投资[2017]228号)

作者简介:周丽(1982—),女(苗族),湖南怀化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农村贫困治理研究。

工成本,增加移民生计多样化的可能性。

第二层次,安置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和就业帮扶等各方面均有政策规划和保障,配套了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公共

管理机构和设施,并实施了就业帮扶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这些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的配套完善,极大地改善了移民生产生活条件,也为移民生计多样化提供了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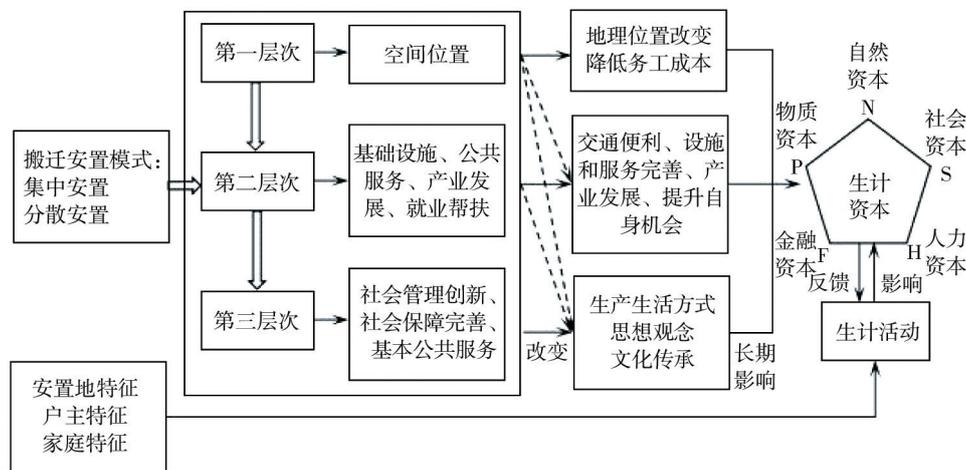


图1 安置模式对移民生计活动的影响机理

第三层次,易地搬迁安置还同步启动了户籍、土地、社保等配套改革,移民不仅在文教卫体、培训就业、社会保障、社区管理等方面享受与迁入地居民同等待遇,其在迁出地的自然资源、农地、宅基地、集体资产收益等权益也有相应保障<sup>①</sup>。这类制度政策的配套完善,推动了移民生计活动转型,有利于移民生计可持续性。

在这三个层面上,不同安置模式对移民生计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首先,在第一层次上,分散安置一般离原住址较近,而集中安置普遍迁移距离要远大于分散安置,这意味着集中安置的地理位置改变使得移民各类生产生活成本改变的程度要大于分散安置。其次,在第二层次上,相比于分散安置,集中安置由于集中规划带来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移民能够享受到更便利的基础设施,更合适的产业帮扶,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为集中安置移民后续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可能。最后,在第三层次上,后续配套扶持政策会对移民生计产生持续、长久的影响。如农地确权,有利于促使离土地更远的集中安置移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医疗卫生、低保救助、社保养老、社区管理、文体交流等方面的措施会长久改变集中安置移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影响其在农业生产经营、外出经商打工、非农经营等生计活动之间的选择,

进而影响到移民可持续生计的形成。

## 二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1. 研究区域

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经济发展滞后,支撑基础薄弱,片区整体为限制开发区,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矛盾突出,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高度重合,是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重点区域。湖南省的易地扶贫搬迁对象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搬迁人口占湖南省搬迁人口总数的68.24%。因此,本文选择位于湖南省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的7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区域,这些县(市、区)均为国家级或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县。

###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7年7~10月在湖南省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7个县(市、区)的入户问卷调查。数据抽样过程:首先,在每个受调查县(市、区)选择乡(镇)2个,共抽取14个乡(镇)。样本乡镇必须满足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且搬迁人数较多,并既有集中安置又有分散安置移民的条件。然后,对抽中的14个乡(镇)各抽出1个集中安置村和1个分散

<sup>①</sup>舒隽:《乡村治理变迁与新乡贤的当代表达》,《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安置村。最后,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对抽中的村各抽取 10 户移民。入户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状况、社会人口特征,安置点的移民搬迁安置情况,政府搬迁安置政策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 28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29 份,有效率 93.5%。调查数据采集时间设定为搬迁前 1 年为 2014 年,搬迁后 1 年为 2016 年。调查的 229 户移民包括 844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其中,样本农户户均家庭规模为 3.7 人,户均劳动力数量为 1.95 个;男、女性分别占 56.8%,43.2%;集中/分散安置比例分别为 72%,28%。

### 三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 1. 研究设计

1) DID 模型构建。移民安置由政府组织实施,不同安置模式是政府实施的不同安置政策,本文运用 DID 模型对不同安置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检验。DID 模型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将调查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政策或项目实施作用的对象作为实验组,一组是非政策或非项目实施作用的对象作为对照组。然后对实验组受政策或项目实施作用前后的效果与对照组未受政策或项目实施作用前后的效果进行比较,其差值就是政策净效应。已有文献在研究安置模式与移民生计活动关系时,一般将未搬迁农户设置为对照组<sup>①②③</sup>,比较搬迁农户与未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差异,较少区分不同安置模式对移民生计活动的影响,因此不能有效认知政府主导的安置政策是否有利于移民生计可持续,无法对安置政策提出改进意见<sup>④</sup>。部分学者运用 DID 模型比较分析两类政策的实施效应,就对照组和实验组的选择做了一些探索。诸培新等以农户主导型土地流转为对照组与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进行比较,研究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是否更有利于农民增收<sup>⑤</sup>;吴爱娣等以市场主导型农地流转作为对照组,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为实验组,分析了农地流转中政

府干预力量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效果<sup>⑥</sup>;赵旭等将后靠移民和外迁移民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了外迁政策相比后靠政策对移民土地处置行为和生计转型的影响<sup>⑦</sup>。借鉴上述文献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选择方法,并考虑到分散安置使移民生计行为较少受到政府政策的干预,本文将分散安置移民和集中安置移民分别作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因此,本文使用搬迁安置前后两个时期的截面数据,采用 DID 模型,以集中安置移民为实验组、分散安置移民为对照组,分析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移民生计资本变化情况,评估两种安置模式实施效果。为控制其他因素影响,本文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模型设定为:

$$Y_{it} = \beta_0 + \beta_1 G_{it} + \beta_2 D_{it} + \beta_3 G_{it} \cdot D_{it} + \alpha X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i$  表示移民个体; $Y_{it}$  为第  $i$  个移民  $t$  时期的生计资本水平; $D_{it}$  为时间虚拟变量( $D_{it} = 0$  表示安置前, $D_{it} = 1$  表示安置后),反映安置前后两期本身差异; $G_{it}$  为组别虚拟变量( $G_{it} = 0$  表示农户  $i$  属于对照组, $G_{it} = 1$  表示移民  $i$  属于实验组),反映对照组和实验组本身的差异; $G_{it} \cdot D_{it}$  表示交互作用( $G_{it} \cdot D_{it} = 1$ ,若  $i \in$  实验组且  $t$  为安置后;其他取值为 0),度量两种安置模式的实施效果; $X_{it}$  为一组可观测的影响移民生计资本  $Y_{it}$  的控制变量; $\mu_i$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 $\lambda_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应用 DID 方法要满足共同趋势假设,即除了安置模式外,控制变量在移民搬迁中不会出现不同的变化趋势,这需要保证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移民在执行不同安置方式前存在相似禀赋。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来处理这一问题,基本思路是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找出尽量相似的个体,相互匹配后再观测各配对组因变量是否存在差异。具体步骤为:首先,根据实验组变量和控制变量估计倾向得分;然后,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指定个体 ID 并对得分进行核匹

①金梅,申云:《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

②张超正,杨钢桥:《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18 年第 10 期。

③宁静,殷浩栋,汪三贵,等:《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 8 省 16 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 PSM-DID 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 年第 11 期。

④龙彦亦,刘小珉:《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生计空间”视角解读》,《求索》2019 年第 1 期。

⑤诸培新,张建,张志林:《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对政府主导与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的比较分析》,《中国土地科学》2015 年第 11 期。

⑥吴爱娣,夏显力,翟黎明,等:《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对转出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 DID 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国土地科学》2018 年第 2 期。

⑦赵旭,肖佳奇,段跃芳:《外迁安置、土地流转及水库移民生计转型》,《资源科学》2018 年第 10 期。

配,测算“集中安置/分散安置”移民搬迁前后生计资本变化;最后,观察两者间是否不再具有显著性差异,以此判断模型是否通过稳健性检验。

2) 生计资本计算方法。首先,借鉴刘婧等的做法<sup>①</sup>,采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各指标进行赋权,根据熵值法确定的权重见表1。其次,由于移民生计资本的指标变量在单位和量纲上均有所不同,为消除量纲影响,需对各指标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取 Min-max 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均一化处理。最后,采用加权标准化模型,根据标准化后的指标值及权重,分别计算出移民各类型生计资本值和生计资本总值。标准化模型的表达式为:

$$Z_{ij} = \sum_{i=1}^6 \sum_{j=1}^n Y_{ij} U_{ij} \quad (2)$$

式(2)中:  $Y_{ij}$  为第  $i$  类生计资本的第  $j$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U_{ij}$  为第  $i$  类生计资本的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Z_{ij}$  表示生计资本总值。

## 2. 研究变量选取

本文采用 DFID 提出的 SLA 框架,以移民生

计资本变化来反映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实施效果。借鉴 Sharp<sup>②</sup>、李小云等<sup>③</sup>、杨云彦和赵锋<sup>④</sup>以及丁士军等<sup>⑤</sup>度量不同类型生计资本的评估指标,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移民实际情况,构建了移民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自然资本是指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源,本文选取移民家庭人均耕地种植面积和人均林地种植面积、耕地质量作为测量指标。物质资本是指农户生计发展必需的物质基础条件,本文选取移民家庭房屋结构、移民家庭固定资产情况、村庄生活用水情况作为测量指标。金融资本是指农户可以支配和筹措的资金,本文选取移民家庭总收入、是否获得过正式/非正式金融支持作为测量指标。人力资本是指农户家庭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等,本文选取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参加非农培训人次作为测量指标。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家庭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本文选取急需大笔开支可以获得资金支持的户数、是否参与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拜年网规模、与周边人人际交往情况和公共事务参与情况作为测量指标。

表1 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资本类型	测量指标	指标赋值	权重
自然资本 N	移民家庭人均耕地种植面积 $N_1$	人均耕地实际种植面积(亩)	0.25
	移民家庭人均林地种植面积 $N_2$	人均林地实际种植面积(亩)	0.66
	耕地质量 $N_3$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0.09
物质资本 P	移民家庭房屋结构 $P_1$	土木=1;砖木=2;砖瓦=3;钢筋混凝土=4	0.04
	移民家庭固定资产情况 $P_2$	耐用消费品和大型生产工具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总量(%)	0.56
	村庄生活用水情况 $P_3$	有自来水=1;无自来水=0	0.40
金融资本 F	移民家庭总收入 $F_1$	家庭实际年收入(元)	0.30
	是否获得过正式/非正式金融支持 $F_2$	获得过=1;未获得过=0	0.70
人力资本 H	家庭劳动力数量 $H_1$	家庭实际劳动力人数(人)	0.21
	参加过非农培训的人次 $H_2$	实际参加培训人数(人·次)	0.75
	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 $H_3$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0.04
社会资本 S	急需大笔开支可获资金支持户数 $S_2$	可以借到钱户数(户)	0.20
	是否参与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S_3$	是=1;否=0	0.46
	拜年网规模 $S_3$	过年拜访的亲朋好友户数(户)	0.12
公共事务参与情况 $S_5$	与周边人人际交往情况 $S_4$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0.04
	公共事务参与情况 $S_5$	从不=1;偶尔=2;一般=3;较多=4;经常=5	0.18
生计资本 Z	$Z=N+P+F+H+S$		

①刘婧,郭圣乾:《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信息熵法的实证》,《统计与决策》2012年第17期。

②Sharp K. *Measuring Destitution: 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 2003, p.217.

③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4期。

④杨云彦,赵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

⑤丁士军,张银银,马志雄:《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6期。

根据 DID 模型,本文将生计资本及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 5 个单项资本设定为因变量进行分析,解释变量中引入时间虚拟变量和组别虚拟变量。交互项为双重差分项,代表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净影响,是本文研究的关键变量。考虑到移民人口特征和安置地环境特征会对安置效果产生一定影响,本文

将户主年龄、家庭规模、非农就业占比,安置地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共 5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按照 DID 模型设定,如果交互项  $G_{it} \cdot D_{it}$  统计量显著,说明安置模式差别是两组别移民生计资本差异的主要因素,反之,则说明安置模式差别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不明显。

表 2 DID 模型变量定义及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变量取值及描述	均值	方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因变量					
自然资本(N)	$N \in [0, 1]$	0.09	0.01	0.77	0.00
物质资本(P)	$P \in [0, 1]$	0.55	0.03	1.00	0.04
金融资本(F)	$F \in [0, 1]$	0.50	0.13	0.95	0.00
人力资本(H)	$H \in [0, 1]$	0.26	0.08	0.95	0.00
社会资本(S)	$S \in [0, 1]$	0.32	0.03	0.84	0.00
生计资本(Z)	$Z = N + P + F + H + S$	1.71	0.39	3.28	0.27
解释变量					
安置前后 ( $D_{it}$ )	前=0,后=1	0.50	0.50	1.00	0.00
安置模式 ( $G_{it}$ )	分散安置=0,集中安置=1	0.72	0.45	1.00	0.00
交互项 ( $G_{it} \cdot D_{it}$ )	—	0.36	0.48	1.00	0.00
控制变量					
安置地交通条件 ( $X_1$ )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3.08	1.24	5.00	0.00
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 ( $X_2$ )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1.62	0.95	5.00	0.00
户主年龄 ( $X_3$ )	实际观测值(岁)	53.30	12.35	87	25
家庭规模 ( $X_4$ )	家庭总人口(人)	3.69	1.28	8	1
非农就业占比 ( $X_5$ )	非农就业人数/家庭总人口(%)	0.54	0.26	1	0

## 四 结果分析

### 1. 样本农户易地搬迁情况统计分析

基于调研和问卷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搬迁农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生存型”移民;另一类是面临住房条件差、就医就学难等问题的“发展型”移民。调查区域的绝大多数建档立卡搬迁户面临生存、发展的双重约束,迫切需要实行易地扶贫搬迁。

受访搬迁户中,本乡镇内安置占比 87.5%,本乡镇外安置占比 12.5%。安置方式以集中安置为主,占比 72%,78%的安置房为政府统一建设。移民的搬迁安置成本中占比最大的为建房成本,政府对移民按每人 3 万元补贴,但按目前乡镇建房每平方米 1500 元左右的造价折算,三口之家按政策建 75 平方米需建房成本近 12 万元,移民户资金缺口大,需要借款或贷款投入。

土地作为农户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权益,国家虽明确提出可以根据移民安置地的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通过依法开发耕地、调整置换土地等形式配置土地资源,可以对搬迁安置区内具备土地整理条件的土地进行土地整理、恢复和再利用,但由于承包地时效性、非农用地复垦恢复时间等原因,移民的土地调整开发效果并不明显<sup>①</sup>。调查显示,73.25%的农户的原承包地主要还是以自己耕种为主,土地流转率不高,存在抛荒现象,原宅基地复垦利用也相对滞后。同时,由于调查区域的本乡镇内安置和集中安置比例较高,移民邻里关系、交往频率、干群关系、社区融入情况均比较好,社会融入程度较高。

### 2.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运用 Stata15.1,将生计资本及 5 个单项资本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 DID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sup>①</sup>李聪:《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来自陕南山区的证据》,《经济经纬》2018 年第 1 期。

表3 DID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生计资本
常数项	$\beta_0$	0.167***	0.105**	-0.229*	-0.030	-0.019	-0.006
		(6.23)	(1.64)	(-1.94)	(-0.58)	(-0.24)	(-0.03)
安置模式( $G_i$ )	$\beta_1$	0.003	-0.025	0.035	-0.025	0.067**	0.054
		(0.26)	(-1.03)	(0.66)	(-1.05)	(2.46)	(0.73)
安置前后( $D_i$ )	$\beta_2$	0.023	0.376***	0.155**	-0.021	-0.018	0.515***
		(1.47)	(9.99)	(2.15)	(-0.58)	(-0.46)	(4.59)
DID估计值( $G_i \cdot D_i$ )	$\beta_3$	-0.025*	0.132***	0.019	0.003	0.160***	0.289***
		(-1.70)	(3.58)	(0.27)	(0.10)	(4.17)	(2.63)
安置地交通条件( $X_1$ )	$\alpha_1$	-0.012**	0.008	0.049**	0.014	0.024*	0.084***
		(-2.27)	(0.89)	(2.41)	(1.35)	(1.94)	(2.80)
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 $X_2$ )	$\alpha_2$	0.020***	0.009	0.073***	0.045***	0.019	0.166***
		(3.72)	(1.00)	(4.46)	(5.71)	(1.44)	(6.59)
户主年龄( $X_3$ )	$\alpha_3$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43)	(-2.41)	(-0.51)	(0.83)	(-0.37)	(-0.49)
家庭规模( $X_4$ )	$\alpha_4$	-0.023***	0.006	0.058***	0.024***	0.018**	0.083***
		(-5.09)	(1.00)	(4.71)	(4.38)	(2.10)	(4.29)
非农就业占比( $X_5$ )	$\alpha_5$	-0.059**	0.001	0.093	0.155***	0.028	0.218**
		(-2.52)	(0.02)	(1.43)	(5.80)	(0.64)	(2.25)
R <sup>2</sup>		0.205	0.718	0.182	0.138	0.184	0.443
F		6.09	191.31	16.49	12.12	16.65	48.28
Prob>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

1)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对移民自然资本产生显著净减效益。模型1交叉项 $G_i \cdot D_i$ 系数 $\beta_3 = -0.025$ ,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搬迁前后,集中安置移民自然资本相比分散安置移民净减0.025。自然资本变化主要由人均实际种植的耕地和林地反映,由于土地政策没有及时调整,集中安置移民搬迁后不能分配到新的土地,而且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更加远离原有耕地和林地(调研数据显示,集中安置移民现居处离耕地距离比分散安置移民平均要远0.4公里),农业生产花费的人力物力成本上升导致集中安置移民弃种抛荒的情况更普遍,所以集中安置移民的自然资本相比分散安置移民降低程度更大。安置地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控制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增加移民自然资本,但安置地交通条件越好,移民自然资本却显著减少,可能的原因是交通条件好使移民增加了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活动,导致自然资本降低<sup>①</sup>。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和非农就业占比三个反映人口特征的控制变量对集中安置移民的自然资本产生显著影响,说明户主年龄越小,家庭成

员越多且非农就业占比越大,集中安置移民越倾向于脱离农业生产经营而实现非农就业,导致自然资本下降。

2)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对移民物质资本产生显著净增效益。模型2交叉项 $G_i \cdot D_i$ 系数 $\beta_3 = 0.132$ ,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搬迁前后,集中安置移民物质资本相比分散安置移民净增0.132。集中安置点统一规划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给移民带来的居住环境改善更为明显,导致集中安置移民的物质资本相比分散安置移民变化更大。

3)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对移民社会资本产生显著净增效益。模型5交叉项 $G_i \cdot D_i$ 系数 $\beta_3 = 0.160$ ,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搬迁前后,集中安置移民社会资本相比分散安置移民净增0.160。现有集中安置社区选点大都靠近县城或乡镇,经济合作组织和各类技术技能培训资源更为丰富,政府也配备了专门人员和机构对集中安置社区进行管理,集中安置社区的移民能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比以前更加及时有效的信息资源,生产、生活、就业的选择渠道也更

<sup>①</sup>李文祥,吴征阳:《贫困治理的场域观与社会工作增权》,《江淮论坛》2019年第6期。

加多样,从而对其社会资本产生显著正向效应。控制变量中,安置地交通条件和家庭规模对集中安置移民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交通条件越便利的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也相应越丰富,就越能够提升移民社会关系网络价值,促进移民社会资本增加。家庭成员越多,社会关系网络节点越多,移民社会资本的累积提升也就越快。

4)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对移民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净效益不显著。模型 3 和模型 4 估计结果显示,交叉项  $G_i \cdot D_i$  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集中安置移民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加幅度与分散安置移民增加幅度之间的差异不明显。主要原因是:虽然集中安置移民能够更便捷地获取政府支持的各项金融政策信息,但由于后续产业发展规划和前景不明朗,即使移民获得借款贷款,也没有合适用途,加上移民受传统经营理念束缚,对借款贷款行为存在抵触心理。另外,数据显示移民家庭劳动力数量在搬迁前后变化较小,导致集中安置移民的人力资本增加幅度不显著。

5)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对移民生计资本产生显著净增效益。模型 6 交叉项  $G_i \cdot D_i$  系数  $\beta_3 = 0.289$ ,通过 1% 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搬迁前后,集中安置移民生计资本相比分散安置移民大幅净增 0.289。两种安置模式下的移民在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上的显著差异,是集中安置移民相比分散安置移民生计资本显著大幅净增的主要原因。这

一分析结果验证了政府大力推进实施的“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的安置政策效果。控制变量中,安置地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变量均通过 1% 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移民生计资本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安置地交通条件便利和经济发展水平高有利于移民生计资本增加。家庭规模、非农就业占比两个变量对移民生计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移民家庭规模越大、非农就业占比越高越有利于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累积增加。

### 3.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利用 PSM-DID 方法对安置模式影响移民生计资本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4。PSM-DID 方法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之后,需检验各控制变量在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分布是否平衡。经平衡性检验,匹配后的各控制变量均值在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样本数据适合 PSM-DID 方法,且研究结论具有相当的可靠性。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处略去具体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表 4 结果表明,集中安置移民相比分散安置移民依然显著增加了生计资本总量,并且在自然资本上也有显著净减效应,在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上仍然有显著净增效应,安置模式对移民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影响效应还是不显著。对比 PSM-DID 估计结果与前文 DID 估计结果并无显著差异,说明安置模式对移民生计资本影响的 DID 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 4 安置模式影响移民生计资本的 PSM-DID 稳健性检验

	政策前实验组 与对照组差分	政策后实验组 与对照组差分	双重差 分结果	政策前实验组 与对照组差分	政策后实验组 与对照组差分	双重差 分结果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差分值	0.008	-0.020 *	-0.027 *	-0.038	0.119 ***	0.157 ***
标准误	0.011	0.011	0.016	0.023	0.023	0.033
T 值	0.66	1.73	1.69	-1.64	5.09	4.76
P 值	0.507	0.084	0.091	0.101	0.000	0.000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差分值	-0.033	-0.033	0.000	0.075	0.237 ***	0.162 ***
标准误	0.023	0.023	0.033	0.028	0.028	0.039
T 值	-1.43	1.43	0.00	2.73	8.59	4.14
P 值	0.154	0.154	1.000	0.007	0.000	0.000
		金融资本			生计资本	
差分值	0.052	0.058	0.006	0.063	0.361 ***	0.298 ***
标准误	0.049	0.049	0.069	0.078	0.078	0.110
T 值	1.05	1.18	0.09	0.81	4.64	2.71
P 值	0.295	0.239	0.926	0.419	0.000	0.007

##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两期截面数据,采用 DID 模型探讨集中安置移民与分散安置移民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的差异,检验两种安置模式的实施效果,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配套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实施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生计资本总量有显著增加。(2)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会显著增加移民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也会显著减少移民自然资本,且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加量大于自然资本减少量;(3)集中安置会增加移民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但增加量与分散安置移民增加量没有显著差异;(4)移民安置点选择、家庭非农就业占比会显著影响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将安置点设在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会促进移民社会资本增加,进而促进生计资本增长,正向影响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非农就业占比越高,越有利于移民生计资本累积提升,对扶贫搬迁减贫效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启示。第一,配套完善安置区域基础条件。加强集中安置点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为移民提供良好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提升移民物质资本提升获得感。第二,增强移民社会资本累积能力。完善移民社区管理服务功能,建立共享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重视发挥各类组织作用,扩充移民交际网络范围和质量,扩大移民安置地公共事务参与度,增加移民社会资源禀赋。第三,创新土地流转促进自然资本保值增值。适时调整土地政策,创新土地转包、转让、出租、入股等土地经营权实现方法,促进自然资本合理配置和后续增值利用。第四,提高移民人力资本存量。做好后续非农就业安置、技能培训服务,培育移民人力资本,提高移民择业竞争能力和就业适应能力。鼓励安置区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地就近就业岗位,有效促进移民生计稳定改善。第五,完善财政金融扶持政策。盘活农村存量资产,积极推行“三权”抵押贷款融资,增强移民资产收益能力。用好财政支农扶贫资金,创新支农扶贫类金融产品,探索移民信用贷款,为移民生产和创业提供资金支持。用活银行资金,放宽个人担保抵押限制,推进移民扶贫小额到户贷款贴息,提升移民发展生计资本能力。

## The Resettlement Mod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nd the Change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in Hunan Province

ZHOU Li & LI Hongmei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total amount of living capital of centralized resettlement migrants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dispersed resettlement migrants. Among them, the immigrants' material and social capital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natural capital i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increase of material and social capital is greater than the decrease of natural capital, while the increase of financial and human capital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choice of resettlement sit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househol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immigrants, 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relocation.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improve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resettlement areas, increase the social resource endowment of immigrants, increase employment support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adjust land and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mmigrants' livelihood.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livelihood capit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DID model; resettlement mode

(责任校对 蒋云霞)